塔希提岛华人社团历史初探*

邓爽　梁偲翀　李晗冰

摘　要：塔希提岛是南太平洋上的法属波利尼西亚118个岛中的主岛，也是目前法属波利尼西亚华人社团最多、最集中的地方。100多年来，随着历史演进与华人本身的需要，塔希提华人逐步创办了信义堂、吾行堂、中华会馆等种类繁多的政治、文化、地缘组织，提升了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社团也在不断发展中增加了更广泛的功能，在当地华人与新华侨、政府、中法波交流中逐渐展现出更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华人华侨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919(2025)04-0088-15

DOI: 10.20254/j.cnki.2096-4919.2025.4.08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ahiti

DENG Shuang & LIANG Caichong & LI Hanbing

Abstract: Tahiti, the largest of the 118 islands of French Polynesia in the South Pacific, is home to the most populous and concentrated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reg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response to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 evolving needs of the community, Chinese residents in Tahiti have established a range of political, cultural, and regionally based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Si Ni Tong, Ng Hang Tong, and Philanthropic Association.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levat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s social standing. Over time, they have expanded their functions and have become vital institutions in connecting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government while also facilita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France, and French Polynesia.

Keywords: French Polynesia; Tahiti; Chinese immigrant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associations

* 本文为对外合作交流中心建设专项亚合资金项目“命运共同体下的中国与东盟共建共享：成效、经验与提升策略”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近年来，南太平洋动态受到全球关注。2014年和2018年，习近平主席曾两次访问南太并同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开启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新篇章。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希望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以旅游年为契机，扩大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务实合作，加深相互了解，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福祉。[①]2022年5月，王毅外长应邀访问南太并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也在《“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虽然法属波利尼西亚（Polynésie française，下文简称“法波地区”或“法波”）作为法国海外属地和联合国非自治领土，不能被列入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但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国际合作的溢出效应，一并带动了法波地区与中国的合作。随着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逐渐增加，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国与法波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已达13,973万美元[②]，较2017年增长92%，中国已一跃成为法波地区第三大进口国。

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法波地区总人口约为28万人，其中华裔人口占比约5%[③]，是南太平洋诸岛中移居华人最多的地区。塔希提岛（Tahiti，当地华人称“大溪地”）作为法波地区主岛，是全法波华人及其社团数量最多的地方，拥有信义堂、致公堂、故铭堂、中华会馆四家百年华人社团。一百多年来，华人社团已成为构建中法波友好稳定联系，联络法波华人华侨，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因此，增强对塔希提华人社团的研究与了解，考察塔希提华人社团的历史沿革，分析其在塔希提乃至法波地区历史，特别是在当地华侨华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其在塔希提地区的重要地位，华人成为法波地区相关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要素。西方学界对于法波华人的相关研究开启较早，但多数研究中只是简单提及。扬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帕皮提领事馆 .《“中国馆”精彩亮相法属波利尼西亚主席府》. 2019-11-24, https://papeete.china-consulate.gov.cn/chn/jlhz/201911/t20191124_3964653.htm. 访问日期：2025年1月6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23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 2024-1-18, http://www. customs. gov. 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5637259/index. html. 访问日期：2025年1月6日。

③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法属波利尼西亚》. 2022-01-31, https://www.un.org/dppa/decolonization/zh/nsgt/french-polynesia. 访问日期：2025年4月18日。

尼克·费尔（Yannick Fer）从法波宗教史出发，梳理了法波华人、社区、信仰的发展与变化（Fer 2002；Fer 2004）。安娜-克里斯蒂娜·特雷蒙（Anne-Christine Trémon）作为专门研究法波地区的学者，第一个完整描述了该地区社团史（Trémon 2007），从法国殖民史的角度对法波华侨的身份认同历程进行分析，并论述了家庭、社区、血缘的影响（Trémon 2009；Trémon 2017），其成果对当前国际上有关法波华侨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内目前关于华侨华人社团历史，尤其是对法波华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是将其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移民或全球华侨华人的一部分来研究。国内最早开始相关研究的是台湾的童元昭（Tung Yuan-chao）。她对法波华人的早期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Tung 2005），并以华人饮食为线索，探寻华人融入法波本土族群的历程（童元昭 2011；童元昭 2013）。费晟按照南太平洋历史发展中的主要产业变迁进程，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将华人移民、中国市场和南太平洋历史联系了起来（费晟 2014）。王鹏飞概述了法国对法波地区的政策调整，以及“印太战略”对法波华人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的影响，强调法国政策对该地区华人社区的深远影响（王鹏飞 2023）。

华人社团的发展变迁是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重要方面（李安山 2004）。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并于 2024 年在塔希提岛开展田野调查，发现当前国内外研究对华人社团部分历史事件细节的描述存在疏漏和抵牾。受水文灾害影响，近年来法波华人社团的史料档案不同程度受损，一些口口相传的历史也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丢失与偏差。本文以法波地区的华人社团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搜集、实地走访、口述资料收集[①]等多种方法，探讨该地区华人社团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当地社会的角色与影响，一方面有助于保留相对客观、准确的历史档案；另一方面，希望以塔希提华人社团研究为引，增加学界对法波地区乃至南太平洋地区华人研究的关注度，改善当前我国太平洋史研究薄弱（吕桂霞 2021）的问题。

2　塔希提岛华人社团的历史沿革

2.1 种植园时期——华人劳工地缘性社团的孕育（1866—1872）

1866—1867 年，第一批中国劳工到达塔希提岛。主要历史背景是苏格兰种植园

① 采访对象包括信义堂、中国国民党大溪地第一、二党支部、大溪地致公堂、大溪地广东七邑会馆等华人社团领导。

主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从法国殖民政府获准，从中国香港引进劳工到塔希提岛最大的种植园阿蒂玛奥诺（Atimaono）工作（严少祺 1989:11）。

有学者认为，法国殖民政府一般通过社团间接控制移民（Trémon 2007），在此背景下，殖民政府要求华人必须选择加入一个组织，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分别成立了信义堂（Si Ni Tong）和吾行堂（Ng Hang Tong）。其中信义堂的主要成员为客家人（当地人称为Hakka），吾行堂则是广府人（当地称为Punti）组建的社团。随着时间推移，目前仅存信义堂，而吾行堂湮灭已久，且缺乏相关的文字记载（童元昭 2020）。

通过采集塔希提主要侨领和老华侨的口述资料，我们发现，以上观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时间混淆。事实上，种植园时期，法国殖民政府主要通过种植园管理方、军队和华人翻译对华工进行管理，华人内部则以一名客家人作为总头领、部分广府人作为小头领、其余客家人作为被管理人的三层牵制的方式实行华人自我管理，利用华人劳工间不同民俗背景的人群相互制约，确保不形成统一力量。这一时期没有形成正式的华人社团或严密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官方注册，这与华人的劳工身份受到限制有很大关系。[①]

作为第一批到达阿蒂玛奥诺种植园的劳工，广府人Tam Sin（亦有资料记载为Tom Sing、Tam Lim Sin）[②]是受雇于斯图尔特公司和法国殖民政府的华人翻译（Sam 2015 : 91），同时充当法国管理方和华人群体的中间人，需要向种植园和当地殖民政府随时报备华人的抵达、离开、婚嫁、死亡等变动情况，并负责征税和管理华人劳工。这一职责的履行时间至少持续至1875年底。与之类似，来自中国香港的华工们也有一名华人翻译，名叫A Pau。一般由Tam Sin先将英语翻译成粤语，再由A Pau将粤语翻译成客家话（Sam 2015 : 38）。后来二人均被免职，1913年，当地政府重新指派了一名华人翻译（Sam 2015 : 38）。这一制度自1866年起断续执行到1918年中国国民党大溪地直属支部成立才终止（Sam 2015 : 62）。

① 2024年2月20日于塔希提岛帕皮提市访谈沈天送（Roland Sam），沈天送是塔希提知名华人社区历史学家，曾任塔希提信义堂轮值主席（2010—2011）和故铭堂（国民党一支部）副主席（2014—2017），并长期担任塔希提广东七邑会馆主要领导。

② 本文出现的华人姓名均载于当地外语资料中，如仅根据发音译为中文名很可能造成错误。因此，在没有佐证材料确认中文名写法时，文中均采用其外文写法。

2.1.1 土客矛盾

1869 年，塔希提华人社会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当地广府人和客家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一位名叫 Chin Foong 的华人在争斗中丧命，这让殖民当局找到了敲打华人社会的机会。于是，法国总督郎西埃（Émile de la Roncière）要求华人社会交出 18 名嫌犯。经过多轮交涉，最终 4 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被送上断头台的仅有 1 人，名为沈秀纯（Chim Soo Kong）[①]。该事件以沈秀纯一人顶死罪的方式得以“了结”，却成为塔希提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黏合剂。据当地老华侨反映，从此客家人与广府人再未发生大的冲突，整个华人社会空前团结。[②]这是“集体记忆理论”的一种体现，即群体通过共同的经历或象征性事件构建和维系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强化群体认同和内部凝聚力。英雄式的牺牲行为能够在跨越个体和群体的层面上构成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进而成为不同群体间情感共鸣和认同的载体（Halbwachs 1992：95–96）。

关于沈秀纯的死因，说法不一。信义堂的官方观点认为，他是“自愿奉献”（Sam 2015 : 25）。作为沈秀纯的后人，沈天送在整理家族传说后认为，沈秀纯是当时涉案者中唯一一个“单身汉”，这成为他必须要“奉献”的理由，但这种观点仅在沈家内部流传。

关于这件“惨案”发生的原因，根据信义堂的官方说法，是源于不同地域背景的华人之间的争斗（Sam 2015 : 25）。但土客矛盾只是原因之一，这次大规模冲突之前的一年，也曾发生过一次未被记录的小规模冲突，两次冲突的原因具有共性。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是赌博冲突所引发，但根据访谈了解，个中原因至少包括：恶劣的工作环境、赌博引发的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延续，以及不同文化群体的华人翻译之间的矛盾等。[③]其中，对华人翻译间的矛盾以及对于冲突事件的影响，此前学界鲜有关注。出于未知的原因，客家话翻译和广东话翻译之间积怨已久，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当然，也有研究认为这可能是种植园管理方有意为之：殖民政府有意挑拨广府人和客家人的矛盾，以便更好地控制华人劳工（Trémon 2007）。

2.1.2 洪门势力

从时间线与历史资料综合分析，种植园时期的华人劳工也受到洪门势力的影响，

① 沈秀纯是沈天送高祖父的亲兄长。

② 2024 年 2 月 20 日于法阿市访谈老华侨 Daniel Sienne；21 日于帕皮提市访谈该市前副市长房英琼（Charles Fong Loi）；22 日于帕皮提市访谈故铭堂主席 Charles Yeun Long Meho 等人，均提及此观点。

③ 2024 年 8 月 14 日线上访谈沈天送。

而洪门各分支作为太平天国运动一方的参与者，也具有在塔希提掀起土客械斗的动机。

1869年，太平天国运动基本接近尾声，与其他输入华人劳工的国家和地区相同，法波华工中可能也存在部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离中国的参与者。根据信义堂的观点，有五位参与了“中国内战”（当地华人认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士在失败后流落海外，其中排行第三的人在美国建立了秘密组织，而大溪地致公堂是这个美国秘密组织的分支（Sam 2015 : 42）。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将发生在塔希提的广府人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联，但从当地华人社会流传至今的故事来看，当时广府人和客家人处于泾渭分明的对立状态——信义堂在其会刊中并不避讳这个事实，这一点在法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Trémon 2007）。

沈秀纯被执行死刑后，遗体被法国殖民政府秘密掩埋，沈家未能收尸安葬，随后信义堂为沈秀纯修建了衣冠冢。自此，致公堂每年负责祭祀，且于1990年对墓地进行了翻修。关于为何由致公堂祭祀，根据法国学者特雷蒙在塔希提的田野调查，致公堂将沈秀纯视为创始人和精神领袖（Trémon 2007），所以担负起了相关职责，同时特雷蒙认为沈秀纯具有洪门背景，但沈家后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塔希提华人社会给予了沈秀纯极高的认可，笔者在实地走访沈秀纯的衣冠冢时发现，沈秀纯甚至拥有谥号“文辉”[①]。

综上，从时间线来看，华人劳工抵达塔希提发生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的数年间。广府人和客家人作为当地华人劳工中最大的两个群体，无法回避历史事件对他们的影响。虽然尚无证据证明双方直接以“土客矛盾”“太平天国”作为冲突的借口或者旗号，但无论信义堂还是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均保留了这种可能性。因此，结合以上的信息来看，“沈秀纯”事件发生的诱因是复杂的，是经过一系列内外部多种矛盾激化后的结果。

2.1.3 并未消失的吾行堂

一般认为吾行堂（Ng Hang Tong）出现于种植园时期，在土客械斗之后逐渐衰败消失。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并没有深入了解塔希提广府人的社团变迁情况。事实上，吾行堂最初是一个人数较少、由广州及周边的广府人组成的小型群体，成立时间晚于种植园时期，由于沈秀纯事件的发生而加速了与客家人群体的融合。吾行堂

① 其墓碑位于阿鲁埃市（Arue）华人墓地西北侧中部。碑文：显 谥文辉 讳秀纯 沈公大人墓。

在后期发展转变为广东七邑会馆，存续至今，并随着华人社会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涵（Sam 2015 : 42）。这种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客家人数量远远大于广府人数量，广府人缺少同乡适婚女性，且为了避免近亲结婚的问题，逐渐开始与客家人通婚；二是客家人在华人社会活动中更积极、社会声量更大。[①]需要注意的是，广东七邑会馆虽然作为信义堂的轮值主席单位，具有明确的定义、定期的活动和注册登记制度，但并不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固定的办公场所，性质上与其前身吾行堂并无区别。

总体而言，种植园时期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华人社团，各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秘密结社，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目标、宗旨和章程，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社团组织。这一时期，华人社会的社团雏形逐步孕育。此类自发性群体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客观上为下一时期各华人社团的成立和发展积累了必要的条件。

2.2 过渡时期——“代理人”制度与华人社团并存（1872—1931）

在经历了至少 4 年的劳作后，随着种植园的倒闭与劳工合同到期，1870 年左右，华人逐渐离开了阿蒂玛奥诺种植园，参与社会活动。不过，当地政府对华人的管理并未放松。根据 1875 年 8 月 24 日的法令，法国殖民政府将法波华人分为“客家人”和“广府人”两个会众群体，并由会众领袖担任“代理人”，作为华人与政府间的翻译与中间人。

信义堂的前身“华人互助会”便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政府注册。1872 年 8 月 19 日，当地政府正式核准华人互助会成立，法波地区第一个正式的华人社团组织出现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时期，殖民政府仍旧实行“代理人”制度管理华人社会，并没有将管理华人的职责委派给华人互助会。

华人互助会的创始人包括：John Smith[②]、Lee You、Wong Atoong、Chee Ayee[③]、Tangluke、Hinsang、Cheong Shun、Lee Shun、Huipat、Hotie、Quan Snun 和 Hoong Yoon。

① 2024 年 2 月 25 日于帕皮提访谈沈天送。

② 华人，原名 No Foo Sii，他是互助会的翻译，负责协调华人社会和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③ 2024 年 9 月 8 日，笔者线上访谈其后代露西・基由（Lucie Guilloux），了解到 Chee Ayee 实为外号，在客家话中指“第一名”，其真实中文姓氏是黄。另外根据 Family Search 的档案，此人还有一个外号 Ah Pao。

成立后，华人社团开始积累资产。1872年12月24日，根据当地政府第252号决议，华人互助会获准筹建一座医院或收容所，互助会按照自己的相关章程建造了木质结构的关帝庙（Kanti Temple）。1897年，与华人社会交好的土王王室希诺伊王子（Prince Hinoi Pomare）[①]无偿向华人互助会捐献了自己的一块封地：塔玛哈那山（Tamahana）北侧的土地，以供华人建造墓地。随后信义堂又出资购买了相邻的一块名为Tearuepua的土地，二者共同构成了如今的华人义山：慈孝路（chemin du repos éternel）[②]。

1911年5月31日，由一个7人华侨小组[③]主导成立了“信义堂”（Si Ni Tong），并在3天后完成了由华人互助会向信义堂的合并转换，包括股份、资产等手续的交割。信义堂这个名称取代了华人互助会，正式启用。（Sam 2015 : 64）。

国外一些研究认为，这次“改制”象征着华人社团的控制权从契约华工及其后裔手中向工商业新华侨转移（Trémon 2007），塔希提的华人社会进入了过渡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义堂“改制”作为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也在后续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新老华侨在面对会馆经费投向、参与国内革命事业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塔希提华人社会也经历了从分裂到融合再到分裂的发展脉络。直到1950年，在中国台湾当局驻塔希提有关单位负责人姚定尘（Yao Tin Tching）的撮合下，信义堂再次进行了改组，扩大了成员机构的数量，成为当地所有华人社团的领导机构，其主席由当地各个华人社团负责人轮值。这种改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期分裂造成的华人社会离散。

这一时期，在塔希提岛共存着两种华人代表和组织制度：一种是华人社区通过非正式社团（华人互助会/信义堂和吾行堂）内生的，另一种是殖民者通过会众“强加”的外生群体。需要明确的是，信义堂或华人互助会在任何时期从未充当过法国殖民政府管理华人社会的中介，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是信义堂在社会属性上与下文中的中华会馆和国民党直属支部上的根本不同。

① 塔希提土王波马里五世（Pomare IV）的侄子。

② 中法文名称均来自华人墓地中文牌匾。在该义山建造之前，部分侨领的遗体是安葬在关帝庙院内的。1981年信义堂因火灾而重修关帝庙时，在院内意外发现了20世纪的早期华人领袖Chee Ayee等7人的遗体，可见早期华人社会安葬困难的问题。

③ 包括：陈世崇（Chin Foo\Tchung Fo Chong）、罗亚本（Lo A Poung）、李文彬（Li Sang）、司徒成（Tion Theun）、吕谭（Li Tham）、刘生记（Leou Sang Kee）、钟火生（Thung Fa Shung）。

2.3 社团代管华社时期——新的融合与分裂（1931—1973）

1931 年的殖民地法令标志着法国会众制度正式执行，也代表“代理人”制度的终结。法国殖民政府通过中国国民党大溪地直属支部（Koo Men Tong）和中华会馆（Association philanthropique chinoise）对华人社会进行管理。社团取代了“代理人”，充当政府和当地华侨沟通的桥梁和协助管理的“中间人”，而当地华侨则必须根据 1931 年 1 月 7 日法令第一条“亚洲种族移民……可以被强制成为社团成员”，选择其中一个社团加入。法令第二条明确规定，该制度主要为了税收目的而建立，政府设立了针对中国人的特别税。总体而言，当时华人共受到两种税制的影响：一种以“居住权”税的形式征收，另一种则包括对职业活动的税收、适用于更广泛人群的附加税以及雇佣外籍员工的税费。华人社团须负责更新和保管所属华人成员的登记名册，同时将完整副本呈报财务主管部门备案。此外，社团还承担着督促同胞按时缴纳各项会费及税款的职责。选择国民党支部和中华会馆作为管理华人群体中介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社团具备会员制、定期活动、群众基础广泛的特点，可以触达众多华人个体。信义堂虽是最老的华人社团，却没有成为“中间人”，正是因为其鲜少召集群体性活动，因此不符合殖民政府的社会管理要求。同时，信义堂作为社团联合组织（可以将信义堂视为一级社团，其他为二级社团），绕过了会众制度通过二级社团对华人的隐形划分与分裂，仍继续管理涉及整个社区的活动，如重要节日、葬礼和新年庆典。而中国国民党大溪地直属支部和中华会馆则通过会众制度为社团提供了履行社区大部分家庭内外职能的能力——包括登记、缴税、互助、教育与婚丧典仪。

2.3.1 中国国民党大溪地党支部

1918 年 2 月 8 日，经法属塔希提总督的批准，中国同盟会大溪地支部成立，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大溪地直属支部。该党支部由一个五人小组领导，支部主席 Chan Long Thun（中文不详），职业为农民，1918 年 1 月初次到达帕皮提，仅担任了三年主席职务便返回了中国。副主席黄少屏（Wong Sin Ping，广东惠阳人），植物学家，1912 年到达帕皮提，1948 年返回中国。委员 Chao Fat（中文不详），职业为农民，1929 年返回中国。常委巫国顺（Moo Fat，深圳龙岗人），职业为商人，1953 年在塔希提去世。秘书黄子安（Wong Tse On），1914 年抵达塔希提（Sam 2018 : 7）。[①]

① 黄少屏、黄子安、巫国顺的中文名系依《大溪地华侨教育》这一中文书中的记载，对比发音得出。

该支部规章中明文规定“积极鼓励农民和工人入党”（Sam 2018 : 7）。在五人领导小组中，常委巫国顺可以确认从事商业（在帕皮提市内开有商铺），除此之外，支部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属性。其他文献中甚至提到，党支部成员主要以农民和园丁为主（Tchen 2012 : 44）。在行动上，尽管大溪地华人普遍经济条件较差，支部成员仍对国内民主革命相当支持，国民党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大溪地支部工作，尚称努力……该属同志对于党国，甚称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79：177）从塔希提华侨捐款情况来看，“自支部成立起，资助国内讨陈、北伐、讨逆等等，先后资助银元数十万，法郎五万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79：177）。由于成员的工农属性和对革命的支持，一些观点认为他们是“亲共产主义派”（Bruno 2002 : 130）。

但在1936年，大溪地国民党支部发生了分裂，老党员和青壮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原因在于新老党员对于支部财权的争夺，最终导致青壮派被彻底赶出支部（后称一支部）。他们在帕皮提的另外一条街上成立了第二党支部，又称新堂（Sin Tong），一支部则被称为老堂（Lao Tong），从此分道扬镳（Sam 2015 : 38）。双方直到2005年前后才达成和解。[①]该地区国民党支部之间的矛盾也见诸国民党党内史料。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报告描述大溪地支部“党员极能团结”(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98：64)；1940年的五届七中全会报告则显示该支部纠纷多年未息。此外，脱离一支部的不只二支部，还有三支部——曾经是一支部一个党小组的黎爹国民党[②]，在1922年所辖党员猛增至380人，随即在同年12月29日宣布脱离一支部，改组为第三党支部。[③]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支部虽配合殖民政府管理华人社会，却依然被殖民政府严加防范。据沈天送回忆，国民党支部华校曾组织过童子军游行活动，超过200人的童子军队伍让殖民政府十分惊恐和担心，随后强行让各华人社团关闭了中文学校，试图以此打散当地华人的文化传承和凝聚力。[④]

① 2024年8月15日线上访谈沈天送。

② 在国民党党务史料中又称为“黎益爹国民党”，黎益爹与黎爹均为其所在地Raiatea的音译。

③ Si Ni Tong.“Association sinitong. Kuo Min Tang 3”. 2024-2-20, https://sinitongblog. wordpress. com/les-diverses-associations/kuo-min-tang-3/. Accessed 25 April 2025.

④ 2024年8月15日于线上访谈沈天送。

2.3.2 大溪地中华会馆

作为配合法国殖民政府管理华人社会的另一方，中华会馆的成立起源于一场纷争。1911 年信义堂完成改制之后，其内部逐渐出现分歧。其中一方是以陈世崇（Chin Foo）为首的 7 人小组，他们是 1895 年左右抵达塔希提的“新”华侨，他们主张利用社团的不动产收入资助孙中山开展民主革命；而以契约华工及其后裔为主的信义堂核心成员则主张社团的盈利应用于帮助塔希提的中国人，而非政治目的。[①]

对于中华会馆的起源，法国学界存在完全相反的观点，特雷蒙认为，裂痕在信义堂时期就已出现，后期成立的国民党支部即由部分主张资助革命的成员组成；更晚成立的中华会馆则是由主张将资金用于当地华人社会发展的五个商人发起的，发起人为 Wang 先生[②]（Trémon 2007）。麦克·陈（Mike Tchen）则认为，“中华会馆的诞生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结果，而非塔希提人常规认知中的来自信义堂”（Tchen 2012 : 42–43）。陈氏的观点关注到了新老华侨在阶级属性和革命倾向上的区别和对立，而特雷蒙的观点则简单地将信义堂内斗当作事情的起因，双方在观察视角方面存在差异。

这一时期，中华会馆主要从事中文教学、华人帮扶等慈善事业，其下辖的中文小学可以追溯至 1919 年。然而，其开办的华校面临与国民党华校相同的情况，在 1964 年被勒令停办，导致绝大多数 1960 年代及之后出生的塔希提华侨中极少有人可以使用中文，对当地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会馆也开展商业活动，主要在法波地区和中国香港之间从事贸易合作。中华会馆的成员经济条件普遍比较优越，1922 年，会馆成员中的 400 个华人家庭共同出资购买了土王波马里家族的一片土地，盖起了会馆大楼，并在 1937、1998 等年份多次集资重建。

3 新时期塔希提岛华人社团的发展与定位（1973 年至今）

随着华人不断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经济条件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水涨船高，社团的功能也逐渐从某一群体的“抱团取暖”，转向为成员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

① 同上。

② 经中华会馆确认，其创始人应为 1911 年参与信义堂改组的陈世崇。

3.1 华人社团的定位转向

信义堂作为当地华人及华人社团的代表，于1995年牵头成立了法波华人社团联合会，成为法波华人对外交流的一个名片。其他大型社团在向综合性社团发展的道路上，也保留了各自的特色。

1998年，塔希提国民党一支部决定彻底改旗易帜，转型为华人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18年，一支部依照草创时期Koo Men Tong的发音，更名为故铭堂，以缅怀故人，铭记历史。目前，法波地区的国民党支部已逐步剥离政治属性，转变为华人文化组织，其成员也不再被列入中国台湾地区管理的国民党成员名录。

文化传承与交流是华人社团的一个主要任务。中华会馆经过百年发展，逐渐从华商组织向综合性社团转变，成为联结新老华侨的纽带，帮助新华侨融入当地生活，也曾多次组团回国探访。作为最早开设华侨学校的社团之一，该社团目前依然开设普通话、客家话、书法、中法翻译、麻将及中国象棋入门等课程，并于每年7月组织大学生和成年人赴北京开展语言夏令营。桃李协会与帕皮提领事馆多次共同举办中学生中华才艺比赛，Phisigma协会组织文艺演出和慈善活动，桂冠协会、文化协会与法波地区政府协作，负责承办法波中学与上海长宁中学、浙江温岭中学的交流合作。当地华人体育组织如飞龙体育会（AS Dragon）、鸣凤体育会（AS Phenix）、中华体育会（AS Chon-wa）、三民体育会（AS Samine）等，基本脱胎于中国国民党的三个党支部，他们开展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手球，甚至选美活动，如著名的“飞龙小姐”（Miss Dragon）选美比赛。前中国男足队员陶伟曾于1993年前后在飞龙体育会效力。

3.2 组建专门的华人政党

1973年，《法国国籍法》修改，法国政府对出生在法波地区的人开放公民身份，华人获得参与当地政治的机会。1976年左右，华人开始组建政党，参与议员选举。当时成立的第一个政党是华人联合党（Pupu Taina，Taina在当地语言里指华人）。该党创始人是华人会计师刘文锦（Michel Voun-Kim Law），此人早在1972年就以当地政党Te Autahoeraa成员的身份成为议员。其牵头组建的华人联合党的主要宗旨是“保卫华侨”（défense de la minorité chinoise），核心成员以当地华人为主。刘文锦在

1977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议员。[①]

同年，当地政坛出现了第二个华人党派“团结波利尼西亚”（Taatira Polynesia），主席名叫亚瑟·钟（Arthur Chung）。该党主要班底来自中国国民党大溪地第二支部，成员还包括后来成为帕皮提副市长的房英琼（Charles Fong Loi）等人。该党在2000年改名“团结与和平”（Taatira no te Hau），至今仍然活跃。

4　结语

塔希提岛华人社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法波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历程的缩影，也是中、法、波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从种植园时期秘密结社的地缘性自保，到“代理人”制度下正式社团的合法化探索，再到殖民政府主导的“社团代管”阶段的分裂与融合，直至当代转型为兼具文化传承与政治参与功能的综合性组织，华人社团始终以灵活姿态应对外部环境变迁。

值得关注的是，华人社团的功能演变始终与中、法、波三方关系紧密勾连：殖民时期作为政府管理中介的被动性，发展时期政治因素的多重影响，以及新时代作为民间交流的主动性，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社团功能的演变轨迹。如今，各种功能的华人社团不断涌现、中文教育的持续开展，以及华人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活跃表现，不仅标志着华人从社会“边缘群体”向“多元文化参与者”的身份跃迁，更预示着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太区域合作中的潜在价值。

参考文献

费晟.《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认知》. 太平洋学报，2014（11）：55—62.

李安山.《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1）：1—15.

吕桂霞.《我国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现状、问题与愿景》. 历史教学问题，2021（5）：87—94+63.

童元昭.《从饮食看族群关系：大溪地的maa tinito》. 载张玉欣编.《第12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2011：383—396.

童元昭.《大溪地唐餐/Maa tinito的在地性》. 中国饮食文化，2013（02）：72—102.

① 刘文锦相关内容系来自2025年9月2日我们与其子Vincent Law进行的线上访谈。同时，塔希提刘氏族人的传记集*L'histoire de la famille Tahiti Law*（非公开出版物）第14章也记录了这些事件。

童元昭.《在大溪地客家与唐人之间：由Mandarin（华语）谈起》.（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2020（3）：177—190.

王鹏飞.《法国对海外领地分权与管辖政策演变及其特征分析——以法属波利尼西亚地区为例》.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3（4）：10—17.

严少祺.《大溪地华侨概况》. 台北：正中书局，1989.

云达忠，王苍柏.《南太平洋国家华人的经济角色与文化认同》.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3）：46—5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卷 第1部 第2期》.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常务工作》.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Bruno S. *Tinito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de Tahiti: installation, structuration, intégration*. Tahiti : Au Vent des Îles, 2002.

Fer Y., Malogne-Fer Gwendoline. « Christianisme, identités culturelles et communautés en Polynésie française ». *Hermès*, 2002(1) : 355−365.

Fer Y. « L'essor du pentecôtisme en Polynésie française: une histoire hakka ». *Perspectives chinoises*, 2004(86) : 54−61.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am R. *Association des descendants chinois d' Atimaono, 1865−2015*. Papeete : Si Ni Tong, 2015.

Sam R. *La Communaute chinoise et le Koo Men Tong 1, 1918−2018*. Papeete : Koo Men Tong, 2018.

Tchen M. *Les Chinois de Polynésie française : Entre permanence et transformation identitaire*. Papeete : Direction de l'Éducation de Polynésie française, 2012.

Trémon A.-C. "From 'voluntary' to 'truly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French Polynesia, 1865−2005".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07(3): 1−33.

Trémon A.-C. "Cosmopolita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Ethnicity, class and citizenship among the Chinese of French Polynesia".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09(9): 103−126.

Trémon A.-C. "Flexible kinship: shaping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mong the Chinese in Tahit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17(1): 42−60.

Tung Y. (童元昭). "Chinese in Tahiti". In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Ian Skoggard (dir.).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05: 742−750.

Une étude préliminaire de l'histoire des associations chinoises à Tahiti

DENG Shuang & LIANG Caichong & LI Hanbing

Résumé : Tahiti, l'île principale des 118 îles de la Polynésie française dans le Pacifique Sud, est aujourd'hui la région où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est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Polynésie française. Depuis plus d'un siècle, avec l'évolution historique et les besoins spécifiques de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les Chinois de Tahiti ont progressivement créé diverses organisation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et géographiques, telles que *Si Ni Tong*, *Ng Hang Tong* et *Philanthropic Association*. Ces organisations ont renforcé le statut social des Chinois locaux. Au fil de leur développement, elles ont élargi leurs fonctions et jouent désormais un rôle essentiel dans les échanges entre les Chinois locaux, les nouveaux immigrants, le gouvernement, ainsi que dans les interactions entre la Chine, la France et la Polynésie française.

Mots clés : Polynésie française ; Tahiti ; Chinois d'outre-mer et immigrants chinois ; associations chinoises

作者简介

邓爽，“中华家脉”（My China Roots）组织研究顾问。研究方向：华侨华人史。邮箱：jallotang@mychinaroots.com

梁偲翀，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箱：louyleung@126.com

李晗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邮箱：kloseli@vip.163.com